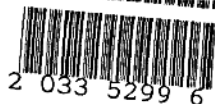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王 蒙

WANG MENG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王蒙代表作

张学正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王蒙代表作

张学正 编 责任编辑 刘建生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75 插页 字数 395 千字

1990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0

ISBN7-215-01538-6/1·121

定价:11.20 元



作 者

西藏的遐思

卫蒙

好奇的天真

稚嫩

温柔的绸带

规定

郑重的程序

如法

一道又一道

程序

炮制

一条一条

摇篮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长篇小说存目)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 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郝世峰 于友先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友先 刘家鸣 刘福友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炎璧

前 言

王蒙，祖籍河北省沧州专区南皮县，1934年生于北京。中学时代，他便和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经常的联系，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1948年，王蒙不满十四周岁被破格吸收为中共党员。解放后，王蒙一直作共青团的工作，有机会熟悉学校和青少年的生活。1953年，19岁的王蒙开始创作他的处女作《青春万岁》，1957年发表若干章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1956年，王蒙发表了震动文坛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现改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7年，他由于这篇作品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至1962年，在北京郊区参加体力劳动。1962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1963年，王蒙为了“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以写出新的作品”，主动要求去新疆。这个要求被批准，全家于1963年底迁至乌鲁木齐。从1963年到1979年，王蒙在新疆生活、工作、劳动了近十六年。其中，1965年至1971年，他曾在伊犁地区的巴彦岱公社当农民并兼任生产大队副队长。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同年夏天，全家迁回北京。他开始了一个新的创作时期。

十年来，他创作了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小说（微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诗歌、文学评论、文艺论文、文学随笔等在内的近三百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被称作“文学上的一个奇才”。

王蒙又是一位令人瞩目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6年6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文化部部长。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少年时代的王蒙，曾把作一个职业革命家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现在，可以说他实现了自己的两个梦：作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梦和作一个文学家的梦。

从王蒙走过的生活与创作道路看，有两点应予特别注意：

一是王蒙不仅入党早，而且一直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工作，可以说，王蒙是在党的亲手培育下长大的。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少年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对党的热爱、忠诚、信仰，是坚定而牢固的。“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志弥坚”。这种经历和思想感情，不仅成了他日后创作的基本素材，而且是他生活的强大动力。在王蒙的人格和作品中，跳动着一颗永远年轻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心！

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1979年彻底平反这二十二年间的不幸遭遇，尤其是1963年至1979年在新疆度过的十六年，可以说是王蒙生活与事业的巨大转折。二十二年中，王蒙无辜地遭受到政治的迫害，精神上、人格上受到种种的屈辱与折磨，沉到了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同农牧民生活劳动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在劳动人民的保护和滋养下，走过了一段艰难的然而又是难忘的人生路程。这是王蒙抚摸伤痕、痛苦思索的二十二年。也是他深入生活、积累生活的二十二年。这期间，他虽然没有写出很多作品，

但诚实的播种、辛勤的耕耘，却为日后的收获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二

王蒙五十年代的创作是对革命和青春的赞歌。他写的《青春万岁》、《小豆》、《春节》、《冬雨》等作品，大多是表现青少年的生活、学习、斗争、友谊、爱情的。这些作品让人们看到的是：中学生夏令营的篝火晚会；节日之夜，天安门广场上空飘天的焰火，通宵的狂欢；喧闹、沸腾的什刹海的溜冰场；五月槐花飘香的季节……。王蒙笔下的祖国阳光普照，生活幸福美好，青春光彩夺目。正如他自己所说：“二十岁的时候，生活和文学对于我象是天真烂漫、美好纯洁的少女，我的作品可说是献给这个少女的初恋的情诗。”即使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篇被称作揭露生活阴暗面作品的结尾，王蒙仍不忘让林震“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表现出他对生活的挚爱、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可以说，歌颂光明、赞美青春，是王蒙前期作品的主旋律。

这里有必要对于曾引起过激烈讨论，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下简称《年轻人》）多作些评述。

《年轻人》是当时“干预生活”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品之一，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在当代文学中，它第一次闯进了文学题材的一个禁区：正面揭露了我们党内、党的心脏——党的领导机关，而且是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市的一个区党委机关中所发生的病变。这在讽刺一位科长、局长已属不易的五十年代，可以说是一种非凡之举，表现出王蒙用文学干预生活的惊人勇气。

《年轻人》中所写的中心人物刘世吾，是革命意志衰退者的典型。他有着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但解放后，他官当大了，地位变了，生活条件好了，反而变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他仿佛看透了一切，认为一切“就那么回事”。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就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但他唯独缺少一种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生活的热情。他不再爱，不再恨，不再操心，对同志和党的事业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冷漠。刘世吾患的是一种更为隐蔽、更为可怕的病症——革命意志衰退症。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讳言：“我们，党的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刘世吾这类人的出现，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并变为执政者以后，如何继续保持与人民的联系，从而继续保持自己的生命？问题提得很及时而且富于远见。直到今天，包括王蒙在内的许多作家仍在重复并深化着这一重大的文学主题。

小说的另一个特色是王蒙严格坚持忠实于生活的原则，没有把人物简单化、脸谱化。作者一方面写出了刘世吾正在霉烂的灵魂，同时也写了他内心的痛苦、搏斗以及短暂的良心发现。他很冷漠，但有时对同志也能表示出某种关切；平时，他强调“条件不成熟”而放弃责任，但时机一到，他也能大刀阔斧地干它一番；面对着象林震这样生活中的新人，他有着善良的愿望与卑劣的欲念相交织的复杂心理状态。在王蒙笔下，刘世吾既不是“死官僚”式的反面人物，林震、赵慧文也不是高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都是各自存在着不同缺陷的活生生的人。这对于当时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小说发表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针对一部分批评者对王蒙

小说及作家本人的政治性的责难与追究，毛泽东同志曾出面为之辩护。他说：“我和王蒙不沾亲不带故，但要给他解围。不能指责作家把地点选错了，北京为什么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有才气，有缺点可以帮助么，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然而，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仍然把他“扩大”进去了。强大的政治风暴，汹涌翻卷的“左”的社会思潮，酿就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历史悲剧，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三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几年，是王蒙创作中一个辉煌喷发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从内容上讲基本上是对十年浩劫的批判和对我国三十年历史的反思。

在《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最宝贵的》、《光明》、《快乐的故事》、《歌神》、《表姐》、《友人和烟》、《买买提处长轶事》、《温暖》等作品中，作者为我们叙述了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悲惨的、荒唐的、令人痛心的和使人感到“快乐”、“温暖”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了我们民族在“文革”中所受的劫难，而且为我们展示了在劫难中各种各样的人的灵魂。其中，象队长铁木耳、书记车德来、木匠莱提甫、文艺处长买买提，以阿凡提的智慧对“文革”的抵制与反抗；民族歌手艾克兰穆对祖国、爱情、艺术至死不渝的追求；市委书记严一行的儿子对“主义、道德和良心”的背叛；在政治风暴下“躲着，藏着，缩着，压着，哆嗦着，哼哼着”的表姐；受到生活的打击而一蹶不振，整天沉溺于烟、酒、发牢骚和忏悔往事的李志豪……都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人

物。通过他们，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那个戕害着、扭曲着同时也考验着、锤炼着人的时代。

这个时期特别值得研究的是王蒙对历史进行反思的作品。

《悠悠寸草心》通过省委招待所理发店的吕师傅所亲历的三十年人世沧桑，生动地反映了建国后我们某些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演化过程。唐久远，作为一名“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官复原职后，不仅把自己在监狱里制定的“三点政纲”忘得一干二净，而且把曾经救过他的命的吕师傅的名字都忘了。上任不久，他和他的老婆同样走后门、搞特权、拍马屁，重新成为高高在上、以权谋私的官老爷。作品最后，吕师傅“扑哧扑哧”掉着眼泪说的关于“官”的一段话，表达了吕师傅和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悠悠关切之情。

《蝴蝶》通过一位高级领导人张思远宦海沉浮的命运，对生活 and 自我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从“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张指导员，到进城后的张主任、张书记，到“文革”中的老张头，再到“文革”后的张副部长，三十年传奇般的经历，使张思远懂得了——一个最简单又是最重要的道理：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心上要有人民，这样才能架起一座“永远与人民相通的桥”，防止变质和异化。《蝴蝶》除政治性的反思外，还有对个人命运的反思。张思远与海云的爱情悲剧，既有政治的干扰，又有个人头脑中种种“左”的观念对爱情的玷污。张思远面对着被车轮碾得粉碎的小白花而对早逝的海云所作的忏悔，说明他与旧我决裂的决心和要开始一种新生活的真诚愿望。

《布礼》、《杂色》等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布礼》写一个对党无限忠诚的青年干部钟亦诚，他和党“本来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只是因为曾

发表过一首四句二十五个字的儿童诗而在“反右”中遭到批判，深文周纳，无限上纲，一夜之间，他竟成了“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曾领导过反右斗争、“文革”中却被当作“走资派”批斗的区委书记老魏同志对钟亦诚讲过一段发自肺腑的话：“人民信任我们。但是我们，我们却用夸大了的敌情，用太过分了的怀疑和不信任毒化着我们的生活，毒化着我们国家的空气，毒化着那些真诚地爱我们、拥护我们的青年人的心……这真是一个大悲剧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几十年来我国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症结所在。《布礼》既是一份沉重的历史反思录，又是一篇当代共产党人的宣言。它重申了挨了打的赤子对母亲的忠诚，为了“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崇高信念，“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他不懊悔，不伤感，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

《杂色》是一篇现代寓言，既是对“严冬的回顾”，又是一首“春的赞歌”。象蚂蚁一样渺小的曹千里和他那一匹比老鼠还要渺小的马，都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种自喻与自嘲。“老右”曹千里骑着他那匹灰杂色马走过大草原，实际上是走过一段人生的路程。作者以同情和赞美的笔调写这匹“不声不响的，不偏不倒的，忍辱负重的马”，“被理所当然地轻视着，被轻而易举地折磨着和伤害着的马”，那不正是写象曹千里这样的人吗？当我们听到那匹马声泪俱下地说：“让我跑一次吧，我只需要一次，一次机会，让我拿出最大的力量跑一次吧！”这不是一位蒙受冤屈、壮志难酬的党的忠诚儿子的呼喊吗？在通过荒凉的戈壁和经过风暴与冰雪之后，在经受饥饿与失重的折磨和得到哈萨克老妈妈的盛情款待之后，曹千里和他的马终于走进了阳光沐浴下的如茵的

草场。曹千里又开始歌唱。老马也变成了一匹“神骏”，“高扬着那高傲的头颅，抖动着那优美的鬃毛”走来了！作品内中的隐喻是不难理解的。

另外，象《夜的眼》、《海的梦》、《春之声》、《如歌的行板》、《湖光》、《相见时难》等作品，也大都是以我国三十年来的政治斗争为背景，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经验和人生体验的思索。应当看到王蒙个人的经历在题材选择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对此，作者有过清楚的说明：“故国八千里（指从北京到新疆的距离），风云三十年（指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变化），我如今的起点在这里。不论《布礼》还是《蝴蝶》，不论《夜的眼》还是《春之声》……都有远远大于相应的篇幅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原因也在这里。……我无时不在想着、忆着、哭着、笑着这八千里和三十年，我的小说的支点正是在这里。”“八千里”和“三十年”成为新时期王蒙小说创作的一个主旋律。

在对于五十年代的令人神往又令人心酸的回顾与反思之后，王蒙小说创作的主题出现多种取向。

《深的湖》写世界性的代沟问题，写了两代人（画家杨恩府同他的儿子小龙）之间思想感情的隔膜以及后来互相理解、逐步弥合的过程。小龙通过爸爸创作的一幅《湖畔》的画和一尊猫头鹰的雕塑，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父辈。“我们惯常以为，我们的爸爸是可怜的，守旧的，胆小的，白白地操劳的，罗哩罗嗦的，世故庸俗而又无可奈何的”。其实，父辈们可能是一个“深的湖”。平时，我们只是看到了它表面的泡沫和涟漪，而没有探到湖水的深处。“甚至于瞪着眼却看不见爸爸创造的猫头鹰的深眼窝”。

《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风息浪止》、《冬天的话题》等作品，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针砭

与鞭挞。王大壮上蹿下跳，四处游玩，组成了一个“脚癣牙病治疗研究培训联合团”，到处招摇撞骗，竟然大获成功，这是为什么？金秀梅本是一名普通的售货员，不知怎么一下子被吹捧成了“典型”，“这个毛丫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上去了”，后来，又一下子“下来了”。老前辈朱慎独与弟子赵小强之间围绕“早浴”还是“晚浴”问题的一场学术论战，不知为何最后竟演变成了人事关系和勾心斗角之争，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狗咬狗一撮毛”。人们可以从这一场场的闹剧中思考许多有关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现实问题。

《高原的风》表现了自我人格的冲突。特级教师宋朝义时来运转，“五年来的好事象排着队游过来的一串金鱼。平反，回迁，特级教师，连涨三级，出版了他撰写的关于乡村语文教学的书……”。五十四岁的宋朝义过去没有离开过“拥挤、寒伧、捉襟见肘、有时候是提心吊胆”的日子；而今万事如意，如坐春风。然而，他的“心情沉重”，他为自己不能实现新的自我超越而苦恼。“他的特级只需要维持，不需要从头作起。摸索、冒新的风险、奋斗，受误解和指责，以及这一切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战栗，都已经不再是他的事”。“在东泉市，他难于超越他自己”。他体会到：“当生活是痛苦的时候，我们为了生活而痛苦。当生活不再痛苦的时候，我们为了自身而痛苦”。《高原的风》写的正是一个人在生活和事业上达到高峰时“那忧患重重的灵魂的痛苦，那与生俱来的火烧火燎一样的焦灼”。

《相见时难》写了革命时期离开大陆的美籍华人。新大陆人系列小说：《轮下》、《海鸥》、《卡普琴诺》、《画家“沙特”诗话》、《温柔》写的则是当今赴美的“淘金者”。他们雄心勃勃来到大洋彼岸，留学、探亲、移民、通婚、开洋荤、捡洋佬、

发洋财，然而并不总是成功的，有的人甚至成了异国他乡的屈鬼冤魂！他们的命运给我们什么启示？可否从两种文化的隔膜与差异中去寻踪索迹？新大陆人系列小说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

1987年，王蒙又创作了《来劲》，这篇万花筒般的作品，描绘了一幅古与今、中与外、美与丑相混杂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态图，让人“感受到新时期新生活跳动的脉搏，感受到生活是如何在对立统一中向前发展的。”

1985年，王蒙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这部作品不仅是他的小说由政治性反思到文化性反思的代表作，而且是文化寻根文学思潮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绘了一座可怕的精神地狱。在这座地狱里，倪吾诚家族的人们或“被吃”，或“吃人”，或“自食”，角色不同，但都无法逃脱其悲剧的命运。作品主要通过倪吾诚这一典型形象，对于摧残、窒息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封建主义文化，对于没有从中国现实中找到结合点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对于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奔突、挣扎，最后沉沦、毁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虚妄、脆弱等劣根性（民族的负面心理），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拷问，正如刘再复指出的，“倪吾诚的心灵历程，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因此，《活动变人形》被文艺界公认为是“民族自我批判书”，“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形记》”，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座奇峰”。

四

王蒙是艺术王国里探索的勇士，创新的旗手。

从创作《青春万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王